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王立新 编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王立新等 编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32 开 印张:11.875 字数:25千字

94年10月第1版 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1004-317-X/G·104

定价:8.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传统文化的范围和对象	(1)
二、传统文化的若干时期	(9)
三、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	(23)
四、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意义、原则和方法	(36)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及其在历史上的流变 ..	(39)
一、儒学的产生及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导	(40)
二、道家思想及其在传统中的重要意义	(63)
三、儒学之成为名教,道学之转为清谈及其 相互撞击与融合	(69)
四、佛教的传入及其与儒道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75)
五、结语	(83)
第三章 根深蒂固的伦理传统	(86)
一、中国伦理传统的源流	(86)
二、中国传统伦理的主要规范	(101)
三、中国传统的修身方法	(114)
第四章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121)
一、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下的“禅让”	(121)
二、夏商周奴隶社会的世乡世禄制	(125)
三、春秋战国之际的军功爵制和养士之风	(132)
四、两汉以察举为主的几种选官制度	(141)
五、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157)

六、隋唐以降的科举制	(165)
第五章 古代文学传统	(188)
一、历久弥新的诗歌	(188)
二、浩瀚无边的散文国度	(196)
三、假声色传情采的戏剧	(210)
四、从未流到主流的小说	(216)
第六章 古代宗教与世俗社会	(236)
一、什么是宗教	(236)
二、宗教的本质	(240)
三、宗教的基本特征	(243)
四、宗教的起源	(245)
五、宗教的历史发展	(249)
六、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	(256)
七、宗教与文化	(267)
第七章 传统经济模式及运作	(275)
一、传统经济结构的形成	(275)
二、传统经济价值观	(289)
三、封建经济的周期波动	(305)
第八章 科技成就与科技传统	(314)
一、漫说古代科技成就	(314)
二、中国古代科技传统中的思维方式	(333)
第九章 中国古代艺术	(336)
一、石器、陶器、瓷器、青铜器	(336)
二、建筑、雕塑艺术	(341)
三、文字与书画艺术	(346)
四、音乐、舞蹈艺术	(363)
编后话	(372)

第一章 绪 论

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风貌、辉煌灿烂的成就著称于世。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也是全人类的骄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汇聚了世世代代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中国人民的无穷创造力,展示了中华民族对整个世界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因此,努力探索、发掘和研究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用我们民族多方面的优秀文化知识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传统文化的范围和对象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氏族社会晚期到“五四”运动以前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在中国范围内所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化。

“文化”这一词汇在我国古已有之。《易·贲·彖传》中有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句,“人文”即指诗书礼乐、人伦道德,“化成”则指教化、化生、变化和造化之意。可以认为,这是已蕴含了“文化”的基本涵意,即与武力征服相对而言的文治教化。在以后出现的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的意义基本上未能超出上述范围。如汉刘向《说苑·指武》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

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晋束皙《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汜而无私，法含弘而不杀”等等。总起来看，古人所说的“文化”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等涵意，基本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与现代所说的“文化”概念存有一定差距。

今天我们通常用的“文化”一词，是十九世纪末通过日文转译引进的。其词在英文和法文中为 Culture，德文为 Kultur，它们都是从拉丁文 Cultura 演化而来的。最初的含义为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敬神等，以后引申为修养、教育、礼貌、知识、情操、风尚等意思。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一些新兴学科的产生，文化这一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但是，由于文化现象的极端复杂性和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的认识产生了极大歧异：有的认为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形式；有的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有的认为文化应分为物质、社会、语言、精神四大主要成份；有的认为文化应分为语言、物质特质、艺术、神话与科学知识、宗教、动作、家庭与社会制度、财产、政府、战争等十大门类。

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r)曾先后为“文化”下过两个定义：一是在《人类早期历史与文化发展之研究》中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一是在《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由此可见，泰勒本人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确切认识。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在中

国学术界开始兴起。“文化”概念的讨论依然是一个学术热点。概而言之,当时学者对文化的定义都不外乎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解释。比如,文化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事;文化即民族精神;文化的真义即精神文化等等,则属于狭义文化。另外则有,文化就是生活;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文化的定义是要对于物质的文化与精神的文化能够加以兼顾等等,属于广义文化。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化定义研究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毕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对文化学的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讨论热潮。与此前的讨论根本不同的是,这次讨论人们普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虽然并不能说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文化的本质及其内涵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共识。大致归纳如下:

其一,文化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又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马克思将人类实践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概括为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的意识是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对全部人类生活具有制约性。马克思所揭示的唯物史观,为我们

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二，所谓文化，一般都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按照列宁的看法，文化和知识之间划一等式，文化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以及对于各种知识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则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的文化学说，明确指出文化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文化是对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其三，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涵义，应作全面性理解。就是说，不能把观念形态与纯抽象的思想意识等同起来。《辞海》中说，观念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除了哲学、宗教、道德、思维方式等等观念形态的东西之外，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等也同样表现出精神价值，凝聚着人们的艺术观念，因此也属于文化研究的对象。当然，科学技术思想也应该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虽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哲学、宗教、艺术、思维方式等关系密切，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因此其中也有属于观念形态的内容。不仅如此，社会风尚、生活习惯等等，同样到处可见观念形态的踪影。总之，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范围是广泛的，对象是多样的，诚如张岱年教授所说：“文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愈丰富就愈繁荣，万紫千红胜过孤芳自赏。”（《文化与哲学》）因此，只有对观念形态

的内涵作全面性的认识,才能较为正确地界定文化的范围和对象。

其四,作为人类精神生产领域的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各种文化形式都具有继承性,因而也就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过程。对文化作历史的研究,既要认识文化和当时经济政治的关系,更要注意文化现象自身的内在联系,揭示其规律性。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精神文化与它的物质基础简单地加以分割,同时也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否则,就会使精神文化失去作为具体事物的特殊性,从而模糊了它的特质。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某个或某几个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经济的状况,具有知识价值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一个包括哲学、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习俗等等在内的有机整体。按照这种观点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反映了中国氏族社会晚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是具有各种知识价值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了古代哲学、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习俗等等,并形成一個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当然,中国文化既具有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具有自己的个性,既鲜明的民族性。中华民族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的精神风貌,民族的风俗、

习惯、传统和道德，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所固有的社会关系或血亲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等等，都与世界其他民族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在探讨传统文化的范围和对象时，必须注意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历史地分析封建时代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民族精神。张岱年教授认为：“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文化与哲学》）民族精神反映了民族文化的本质特点，从总体上说，它凝聚了民族文化的精华。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有比较正确的自我认识。

首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自古至今一直鼓舞着中国人奋发图强，昂扬向上，努力拼搏，去振兴自己的民族。

古人善于类比，往往从自然界的无穷变化中悟出深刻的哲理。既然天道日夜运行、四季交替是永远运动、不修前进的，那么人也应该象自然界（天道）一样刚健有为，不论处于何种何样的险恶境地，不论遇到何种何样的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坚韧不拔。勾践卧薪尝胆，孔子发愤整理古籍，项羽破釜沉舟，司马迁忍辱著《史记》等等，这些有名的历史故事都充分体现了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受内忧外患，但始终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崇尚气节、正道直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尚气节、重操守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一向鄙弃那种朝秦暮楚、奴颜婢

膝、贪生怕死、变节投敌的行径。这种民族的浩然正气，最初由先秦儒家所推崇，以后逐渐深入到全体民众的意识之中，从而培育了无数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

人们至今仍传诵着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古老格言：“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正是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熏陶和培育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形成了我们民族千古不灭的历史传统。

那些恪守民族大义、凛然刚直的历史人物，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成为人们争相仿效的楷模。比如持节北海牧羊的苏武，精忠报国的岳飞，视死如归的文天祥，廉洁清正、勇于献身的于谦，十七岁为国捐躯的夏完淳，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直言敢谏的魏征，刚直不阿的包拯，上疏怒斥严嵩的沈链等，他们称得上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是中国人宝贵的民族之魂。

崇尚气节、正道直行，在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头，常能激发人们的无比勇气和力量，鼓舞人们不畏横逆，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它体现了一种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

第三，豁达乐观，宽容和平。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儒家和道家两条主线。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以豁达乐观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未来的。儒家采取积极入世的生活原则，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把艰难、困顿、挫折、屈辱等等作为砥砺自己的试金石，即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种豁达乐观

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如“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否极泰来”等格言，就充分体现了锐意进取、高瞻远瞩的气度。而道家尽管被认为对人生的态度有某种空想性因素，但象庄子所说：“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庄子·德充符》），即要求永远保持和悦愉快、与物为春的态度，就表现出一种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豁达乐观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同时也拓展了中华民族宽容博大、酷爱和平的胸襟。宽容博大表现在文化上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流，这不仅存在于本民族内部，而且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玄奘天竺取经，宋明理学融儒释道为一体等，无不表现出兼容并蓄、择善即从、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宽容精神。并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酷爱和平，如“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古训，反映了中华民族一向重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以上三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总倾向，概括出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是传统文化延续不绝、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但是，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封建观念体系形成强大的势力，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封建性糟粕，给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发展都带来消极因素和传统的情性。其主要表现有：小农经济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思想，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离状态；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养

成了诸如独断专行、以权谋私、贪脏枉法、特权思想等的腐朽作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扼杀了人们的开拓进取意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德信条，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重道轻器”、“述而不作”的观念，造成了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轻视；“崇本抑末”思想，阻碍了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阻碍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因此，在对传统进行反思时，不能忽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这些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不过，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封建文化。其中有进步与落后、健康与腐朽、科学与迷信的区分，内容错综复杂，绝不能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时把封建时代的整个文化一起抛掉，而应该对传统文化作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如董仲舒这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过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且用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来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含理性。但他同时却又反对分裂割据，主张政治上的‘大一统’；反对豪强兼并土地和过分的压迫剥削，主张轻刑罚、薄赋敛。这些思想中无疑含有某些进步内容。所以，我们对待历史人们和历史现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简单化和片面化。

二、传统文化的若干时期

我们主要依据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来划分传统文化的发展阶段。因为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每一时代的其他文化现象和因素无不受到哲学思想

的影响。古代哲学思想在传统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本着这一认识，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大致分成生成、发展、成熟、转化等四个时期。

(一)生成期

传统文化源于何处？距今有多少年？根据现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前存在着三大民族集团，即河洛民族（华夏集团）、海岱民族（东夷集团）和江汉民族（苗蛮集团）。

河洛文化区，位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陕西、河南龙山文化是其代表。始祖为烈山氏，后来的部落氏族领袖炎帝（即神农氏）和轩辕黄帝联盟，产生了族外婚的婚姻形式；繁衍出世代的炎黄子孙。会种谷物、蔬菜，懂得纺织，会烧制陶器，距今8000—6000年。

海岱文化区，位于黄河下游 黄淮之间的广大地区。这里居住着夷人各部，最早见于史书的是伏羲氏为“九夷”部落联盟首领，始作八卦，教人渔猎。大汶口文化是其代表。后来各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被炎黄打败，并入华夏族。

江汉文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古苗蛮族各部居住地。《史记》中说：“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最早培育出水稻，陶器以黑陶、灰陶为主。湖北屈家岭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是其代表。孕育了其后的楚文化。

三大文化区在以后的交流过程中逐步融合，共同创造了史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其时农业、牧业、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早期的文字等。

我国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了夏朝，开始从氏族

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从商代(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到西周(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 771 年)将近九百年中,奴隶制度得到了高度发展。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和文化日益繁荣,科学技术也得到进步,在天文、历数、医药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宝贵的成就。

研究我国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图腾崇拜、巫术思维和神话思维构成了早期人类认识和思维的重要形式,也构成了原始文化的重要内容。

图腾崇拜属于一种原始宗教,在我国上古时代广泛地存在着。每个氏族及部落以某个自然物作为本族的标志,称为图腾。而每个成员都得承认自己和图腾有特殊的血族关系,并对它顶礼膜拜。《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就是说,以黄帝为领袖的一族是以云为图腾,以炎帝为领袖的一族是以火为图腾,以共工为领袖的一族是以水为图腾,以大皞为领袖的一族是以龙为图腾,他们都以崇拜的自然对象为本族的标记(“纪”)和族名(“名”)。图腾崇拜又常和氏族来源结合在一起,如《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黄,降而生商”,表明玄鸟是商族远祖的图腾。从思维水平来说,图腾崇拜尚未脱离直接性和个别性的认识阶段,但已向间接性和综合性(如“龙”、“凤”图腾)过渡,是人类开始向抽象思维迈出的第一步。

巫术也属于原始宗教的范围,其思维水平略高于图腾思维。巫术的功能在于实用,是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巫”,《说文解字》中说:“祝也。女能事无形

以舞降神者也”，与某种无形中的神灵相交通，相应的其思维特点就明显具有间接性和幻想性。巫术无疑是迷信的产物，但却又与早期的科学知识相联系。《山海经·大荒西经》上的诸巫或“操不死之药”，或“百药爰在”；《周礼》把“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的马医叫“巫马”；古代的医字也从巫而写作“𡩇”。这些都表明在当时科学与迷信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巫术的本质是非科学的或伪科学的，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人类正是总结了巫术的思维教训而走向科学的。

上古神话作为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先民对外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神话的产生宣告人类已从蒙昧、野蛮中苏醒，标志着人类思维从自然性向社会性迈进。它所特有的幻想能力、构思能力和想象能力，孕育着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风俗习惯等的萌芽。需要指出的是，上古神话与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神话把压迫人的自然力同化为一种体现人类自我的伟大力量，而宗教则是把自然力幻想成一种人们只能屈服于它的异己力量。比如在《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记载的神话，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等，都极其明显地反映了人类在实际生活中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这种相信人力能够征服自然的信念，不仅成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种论思想的起源，而且充满了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到了商代，奴隶主阶级为了奴役劳动人民，有意识地利用和改造原始宗教，使天神至上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无论做什么事情，商统治者都要卜问上帝，如卜辞记载：“甲辰，帝

令其雨？”“帝令其风？”“帝其降堇(瑾)？”卜、史、巫、祝这些祀神官，便根据凿灼甲骨出现的裂纹(兆)形状，作出种种适合于统治者要求的解释，声称是上帝的答复。这说明上帝的绝对权威不过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神权和王权是合一的。

周代天命思想开始有所松动。周统治者提出“德”的观念对天命论进行损益，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即上帝是公正的，他只辅佐有德的人。在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时，周统治者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从而又提出“敬德保民”的主张。“敬德”是指遵守奴隶社会的伦理道德，“保民”主要指安抚奴隶。尽管这一主张仍以天命论为根据，但天即上帝的作用已有所降低。《诗经》中有不少疑天、怨天、恨天的诗句，如“天命靡常”、“天命不彻”、“昊天不平”等，就是天命论动摇的例证，也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在商周宗教唯心主义流行之际，与之相对立的古代早期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其代表为《尚书·洪范》的五行说和《易经》的阴阳观。

《洪范》据说是周武王灭商后被俘的商贵族箕子答武王问天道而作。它将世界上的物质概括为五种元素即“五行”，并说明其特性：“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这里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明显是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表明人类已从征服自然的幻想升华为解释自然的科学认识，是从神话思维向哲学思维过渡的重要环节。以后在西周末年史伯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